



高 教 动 态

(半月版)

2015 年第 13 期
(总第 55 期)

嘉兴学院
规划与评估处 编

2015 年 10 月 15 日

目 录

● 高教时讯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1
两部门发文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1
2015 年起设立“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2
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开赛....	2
高教质量评估首次用“中国标准”认证国外大学.....	3
山东规定：高校教师师德不合格评职称一票否决.....	3
河北：六所高校已列入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行列.....	4
江西普通高招明年起取消三本批次.....	4
新疆“十三五”将选拔两万高校毕业生异地培养.....	5
两年 267 万人次选修清华慕课.....	5
复旦大学成立大数据学院.....	6
合肥工业大学：重奖一线教师 最高奖励 120 万元....	6
宁波大学开展“人才培养质量月”活动.....	7

● 决策参考

解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教育利好政策..	8
三个弊端严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11

● 高教视点

推进依法治校 依章管理大学.....	15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	19
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思考.....	23
从“教授治学”到“师生治学”.....	27

● 高教评估

中国高教评估首次走出国门：“新”在哪.....	33
-------------------------	----

● 他山之石

南京大学：探索个性化人才培养途径.....	36
如何高效提升医学临床教学质量.....	37

● 国际视野

中外大学校长怎么看大学排行榜.....	40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大学，在创新中求变....	41
日本将迎来人文学科大削减.....	44



高教时讯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10 月 12 日上午, 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在京举办“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 邀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围绕“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作报告。

袁贵仁在报告中指出, “十二五”以来,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教育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 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加快推进, 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近五年的努力, 我国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国民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 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 教育公平取得重要进展;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教育结构调整优化, 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不断增强; 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教育保障切实加强, 改革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当前,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办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任务艰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 大力促公平、调结构、提质量、增活力、强保障, 努力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2015-10-13)

两部门发文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 切实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近日,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 就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强调, 高校党委要把明晰宣传部门职能、加强宣传力量配备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进一步明确党委宣传部门在统筹意识形态工作、统筹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校园文化建设、统筹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统筹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统筹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职责任务,科学核定并合理配置人员,真正将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的职能要求落到实处。要把政治标准作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聘用人员聘用、考核的首要标准,把政治坚定和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有专长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宣传思想工作重要岗位。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问题导向,统筹队伍发展规划,统筹队伍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知识培训,统筹队伍发展保障体系建设,分层分类推进队伍科学发展。要着力提升网络运用能力,遵循信息网络规律,把掌握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操作技术作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必备能力,练就运用“网言网语”参与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过硬本领。要强化高校党委责任,建立健全宣传思想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检查评估制度,构建党委书记负总责,校长和分管副书记、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有关部门和院(系)协调推进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保障措施。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10-14)

2015 年起设立“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 10 月 13 日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进一步营造优良的社会氛围,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决定从 2015 年起,每年 10 月选择一周作为“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具体时间根据年度安排来确定,每年设置不同主题。

据悉,首届“活动周”定于这一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举行,主题为“创业创新——汇聚发展新动能”。“活动周”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设立主会场,在上海、深圳、西安、成都、武汉、沈阳、合肥等城市分别设立分会场,同时在长春、广州等城市组织若干重大活动。“活动周”期间,组委会将在主会场举行启动仪式、主题展示和专题活动,组委会成员单位和各分会场城市还将组织开展双创相关活动。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5-10-13)

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开赛

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



吉林大学举行, 100 个团队项目将参加现场比赛, 覆盖“互联网+”传统产业、新业态、公共服务、技术支撑平台等领域, 分为创意组和实践组两类进行比赛。

大赛自今年 5 月启动, 至 9 月 15 日已吸引 31 个省(区、市)1878 所高校的 57253 支团队报名参加, 提交项目作品 36508 个, 参与学生超过 20 万人, 带动上百万大学生投入创新创业活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介绍说, 大赛是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 也是交流创新创业教育经验、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成果的重要平台。全国总决赛期间, 将同期召开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座谈会、“互联网+”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报告会、创业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对接洽谈会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

这次大赛的成果转化也备受关注。张大良表示, 目前本届大赛已经吸引大量风投机构关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预计吸引资金总金额会达到 30 亿元。教育部目前正在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搭建项目团队和投资机构对接的桥梁, 加强对项目的后续指导服务, 促进项目孵化落地和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成长壮大。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10-13)

高教质量评估首次用“中国标准”认证国外大学

受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NCPA)的正式邀请,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HEEC)日前选派 8 名高水平专家赴俄罗斯, 对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的 4 个专业(应用数学与信息学、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物理与无线电、医疗护理)进行中俄联合专业评估认证工作。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国外大学进行评估认证。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五位一体”制度, 以高校自我评估为基础, 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 采用“五个度”的质量标准体系(即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和“五个新”的评估模式(即新理念、新标准、新方法、新技术、新文化)。俄方主动邀请我国对其大学进行评估认证, 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中国模式”得到国际认同和采纳。

(来源:《人民日报》2015-10-09)

山东规定: 高校教师师德不合格评职称一票否决

近日, 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山东省教育厅出台指导意见, 推进高校师德建设的规



范化、制度化。规定要求高校教师不得有 8 种违反师德情形，其中包括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

山东规定，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应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职务（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对于违反师德规范的，根据其违规情形，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10-08）

河北：六所高校已列入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行列

河北省政府与教育部近日签署协议决定共建河北农业大学，加上之前已签约的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目前河北已有 6 所高校列入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行列。此外，还有多所高校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信部、国家林业局等签约共建，河北作为“高教弱省”的局面有望改观。

作为人口大省，河北省高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较大，但却只有位于天津市的河北工业大学属“211”高校，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偏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河北多所高校与国家部委、有关地区加强合作共建，在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与协调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去年以来，河北省政府与多个国家部委合作共建高校。其中，与天津市政府、教育部签约共建河北工业大学；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签约共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与工信部、教育部签约决定共建燕山大学；与国家林业局签约共建河北农业大学等。

（来源：新华网 2015-10-07）

江西普通高招明年起取消三本批次

江西省日前出台 2016 年普通高招录取新政策。从 2016 年开始，原二本、三本批次将合并为新的第二批本科批次（其中艺术、体育类分 A、B 段录取），体育类录取增设一本批次。在提前本科批次，对认可江西省艺术统考成绩的外省高校美术与设计类专业实行平行志愿。到 2018 年，省内外艺术类所有专业全部实行平行志愿。

从 2016 年开始，江西省实行本科、高职（专科）分开填报志愿，即本科批次录

取结束后再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在高职（专科）志愿填报后单独划定，推行平行志愿，实行多次征集志愿。此外，省内外高校对招生计划的调整，须在正式投档前完成。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10-13）

新疆“十三五”将选拔两万高校毕业生异地培养

《新疆普通高校毕业生赴援疆省市培养工作“十三五”规划》近日出台，计划到 2020 年择优选拔 2 万名高校毕业生赴援疆省市进行培养。培养后的高校毕业生，将主要面向企业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就业，具体分配为 6000 人面向企业就业、8000 人自主创业、3000 人到县乡事业单位工作、3000 名公务员进行初任培训。培养期间，毕业生计算工龄，给予生活补贴，视为试用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期间享受在岗人员同等待遇；培养后进行网络创业和创办小微企业的，享受创业指导、创业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等创业扶持政策。

据悉，2011 年至 2012 年，新疆分批选送了 2.33 万名高校毕业生，赴 19 个援疆省市及国家部委所属的 188 所院校进行培养。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10-10）

两年 267 万人次选修清华慕课

截至今年 10 月 9 日，共有来自 1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9 万注册学习者选修了清华大学学堂在线慕课平台推出的 504 门慕课，选课人次达 267 万，超过 3 万人获得清华大学慕课课程证书。清华预计未来两年将每年再推出 100 门慕课课程。

2013 年 10 月 10 日，清华大学学堂在线慕课平台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上线两年来，清华共推出了 504 门慕课，其中有 108 门由清华大学开发，其它课程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与机构以及 edX 慕课平台联盟成员高校，内容涵盖计算机、经济管理、理学、工程、文学、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去年 4 月，学堂在线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合作建设的 edX 平台课程在中国大陆的唯一官方授权，目前已有 42 门来自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的课程登陆学堂在线，经翻译后面向中文学习者推出。越来越多国际合作伙伴的加入，将实现中国学习者足不出户的“留学”。

此外，迄今为止，学堂在线还为国内 95 个大专院校及机构搭建了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SPOC）平台，使这些机构能藉此开展慕课建设并推进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清华大学自身也利用慕课开展了 53 门次本科、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试点。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10-14)

复旦大学成立大数据学院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 10 月 8 日正式揭牌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学院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与经济金融、生命科学、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众多学科领域进行深度交叉,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据了解,当前我国的大数据教研机构主要有 3 类:一是以数理统计为基干,致力于基础性数据挖掘、分析和建模;二是以计算机学科为基干,致力于工学设计、计算原理和数据处理工作;三是以商业需求为导向,致力于提供商业问题解决方案等。与此不同,新成立的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将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聚焦大数据学科建设、研究应用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大数据学院将与复旦相关院系建立联合培养计划。其中,本科生培养采取“2+2”模式,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学生可在完成一二年级的学习后申请加入大数据学院的联合培养课程,完成本科学习之后,还有机会进入大数据学院专业硕士和硕博连读项目。按照计划,2016 年 9 月,首批学生将进入大数据学院就读。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10-09)

合肥工业大学:重奖一线教师 最高奖励 120 万元

合肥工业大学日前开展评选活动“同泽优秀园丁奖”,该奖是“同泽奖励基金”在学校开展的首个评选活动。这个基金在 2015 年 5 月由 1987 届校友赵育清代表校园公益基金捐资 1000 万元设立,专项用于学校的奖教、奖学和建设与发展。赵育清表示,希望更多优秀教师获奖,每一位学生在求学期间能有更多优秀教师给他们上课。

2015 年度“同泽优秀园丁奖”设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6 个,优秀奖 10 个。出生于 1979 年的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夏娜教授因本科教学工作业绩突出,在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获得 120 万元的奖金。2015 年度“同泽优秀园丁奖”评选委员会主任贾成炳表示,此次“同泽优秀园丁奖”评选强调以教学为主,以年轻教师为主,就是希望年轻教师尽快成长起来,担当起建设一流学校的重任。

(来源:新华网 2015-10-09)



宁波大学开展“人才培养质量月”活动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凝聚办学理念共识，探索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宁波大学推出“人才培养质量月”系列活动。

一是开展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大讨论。从学校、学院、基层学术组织、教师、学生等五个层面开展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的大讨论，进一步明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培养模式。在全校上下营造立德树人、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调动全体师生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互信、互动、互助的育人机制，解决人才培养中的关键性瓶颈问题，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立质量监控与评估机构，健全质量监控与评估职能，全面实施专业认证与评估工作。出台《新学评教方案》，探索“平时实时学评教+期末学评教”的课堂教学评价新方式。充分发挥校院两级督导作用，与宁波市高校教学督导组构成三级教学督导组织，履行导教、导学、导管理的职责，共同构成学校教学质量的督导监控体系。启动年度专业质量报告，为优化专业结构，凝练专业特色，提升专业竞争力提供数据支持。开展年度专业进位考核，制订《宁波大学学科、专业进位年度考核与奖励实施办法》，实施目标考核和加强过程管理，保障和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和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三是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相关保障机制与激励制度，正式挂牌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全面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做到创新创业训练四年不断线、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分类分层组织学科竞赛实施，在确保竞赛学生参与性和受益面的基础上，兼顾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帮助特长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四是实行人才培养质量的院长述职制度。为进一步突显学院对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的责任与重视，实行人才培养质量的院长述职制度。要求校内各学科性学院重点围绕本科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十三五”期间专业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开展述职评议活动。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网站 2015-10-14）



决策参考

解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教育利好政策

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完善专业设置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以国际同类一流学科为参照的学科评估制度,扩大交流合作,稳步推进高等学校国际化进程。”

“在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方面。此次意见既指明了方式方法,又有实施力度。”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这一方案中,针对高校科研体系、高校人才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目标和意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张军院士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科技改革新政对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

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

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举措]《实施方案》专门有一部分阐述高校科研体系问题,提出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第二十四条规定,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

第二十五条规定,制定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完善专业设置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以国际同类一流学科为参照的学科评估制度,扩大交流合作,稳步推进高等学校国际化进程。

第二十六条规定,启动高等学校科研组织方式改革,开展自主设立科研岗位试点,推进高等学校研究人员聘用制度改革。

[解读]“《实施方案》特别指出,将要完善高等学校科研体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李哲说,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导向,将推进完善治理结构,完善专业设置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以国际同类一流学科为参照的学科评估制度。还提出将在本年内启动高等学校科研组织方式改革,开展自主设立科研岗位试点,推进高等学校研究人员聘用制度改革。

“深化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符合创新规律、定位清晰的治理结构,完善科研组织方式和运行管理机制,加强分类管理和绩效考核,增强知识创造和供给,”李哲说,这是筑牢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据李哲介绍,《实施方案》还提出制定《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规范领导人员任职资格、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监督管理等。在有条件的单位对院长实行聘任制。推进公益类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落实科研事业单位在编制管理、人员聘用、职称评定、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

对科技人员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

高校科研人员可保留基本待遇办企业

[举措] 第十五条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

第十六条规定,开展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人才兼职的试点工作,允许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试点将企业任职经历作为高等学校新聘工程类教师的必要条件。

[解读] “此次出台的方案,强调了根据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等创新活动不同类型,对科技人员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李哲表示,这意味着人才评价更加科学、系统。

改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举措] 这部分涉及人才培养,涉及教学方法改革等多方面。

第二十九条规定,开展启发式、探究式、研究式教学方法改革试点,弘扬科学精神,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改革基础教育培养模式,尊重个性发展,强化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思维培养。

第三十条规定,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着力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加快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转型,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试点,拓展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径与方式。

第三十一条规定,分类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科教结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增进教学与实践的融合,建立以科学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

第三十二条规定,制定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

[解读] “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和汇聚高端科技精英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力量。”张军说,在世界范围看,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有目标的科研”与“自由探索性科研”的有机结合，其本质上是激发科学研究活力与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双轮驱动下的知识创造、前沿探索和自主创新。

张军表示，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研究型大学必须适应这个主题，只有主动求变革、变中求新，找准自身定位，才能在迈向未来的征途中实现创造性卓越，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对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比例，提高到不低于 50%

【举措】第四十三条明确提出，推动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相关政策规定，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中，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 20%提高到不低于 50%。

第四十六条提出，制定在全国加快推行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办法，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放宽股权奖励、股权出售对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建立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制度，对在创新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

第四十九条提出，加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完善技术转移工作体系，制定具体措施，推动建立专业化的机构和职业化的人才队伍，强化知识产权申请、运营权责。逐步实现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与下属公司剥离，原则上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不再新办企业，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鼓励以转让、作价入股等方式加强技术转移。

【解读】“科技投入配置必须紧紧围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加快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安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改善民生提供科技支撑和储备。”李哲介绍，《实施方案》已经细化了未来一段时期的科技发展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科技投入配置将继续优化科技经费配置结构，重点是扶弱壮强，弥补投入短板。

他表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渠道将进一步“通起来”。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治环境加快完善，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应运而生，考评体系、技术转移体系、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不健全以及科技人员激励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障碍将得以加快突破。（

（来源：《科技日报》2015-09-29）



三个弊端严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秦春华

近日,关于“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讨论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自上世纪末大学扩招以来,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今天的博士不如 5 年前的硕士,5 年前的硕士不如 10 年前的本科。”这似乎不只是用人机构的评价,就连学生自己,底气恐怕也不足,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到底学到了多少有用的知识。然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答案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至少要提出诸如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测算的数据是什么,以及统计分析结果的含义是什么,等等关键性问题。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只是凭感觉就得出“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结论,不仅草率,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但有时候感觉也的确反映了部分事实。一方面,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得不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不断推迟就业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用人机构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但放眼望去,几无可用人,寻找合适的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正在加剧。

这说明大学的产品——本科毕业生——没有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至少没有充分满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除了快速扩招,盲目扩大规模和大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三个更为根本性的弊端——我称之为“刻舟求剑”“陪太子读书”和“纸上谈兵”——正在严重影响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弊端,建立起全新的教育模式,大学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就是一句空话。

弊端一:刻舟求剑

“刻舟求剑”是指当前本科教育严重滞后于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兴技术开始颠覆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从国内来看,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变化的速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使得 19 世纪以来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体系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它根本跟不上步伐。正如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森堡所说:“不要成长为一个专才,因为工作会变。当下科技的脚步变化太快,专才会无所适从。”

更大的麻烦在于,20 年后,世界也许会变成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眼光所根本



无法理解的世界。那时候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和今天的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将不再可能从已有的“知识储备箱”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只能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通过合作和协调,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甚至是危机。这就要求大学教育必须要摒弃“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而建立以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育模式。

然而,自 1952 年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相应建立起以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来,专业化思想就在中国大学里根深蒂固。不只是大学,社会的认识也大体如此。如果学生不学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性技术,就像南方人没吃米饭一样,心里没底儿。大学抛弃了古代中国教育中“重道不重术”的优良传统,正在退化为职业技术培训所——不是说职业技术培训所不重要,而是它们和大学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使得通识教育的推行在大学里往往会遭到强烈反对,分外艰难。一个危险性的信号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面对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外部世界,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的专业化训练程度越高,毕业之后适应、调整、转化的余地可能就越小,就好像那个在船舷上刻下记号的楚国人一样,又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剑呢?

弊端二:陪太子读书

“陪太子读书”是指大学教育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现象严重。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按照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大学是由各个专业院系组成的。它们是大学里的“诸侯”,有各自的特殊利益,未必和大学的整体利益相一致。院系的管理者和教师,最关心的是专业教育。这不仅因为这是他们的偏好,也是其利益所在。由于长期专业训练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容易习惯性地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思路 and 模式去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就像其老师曾经做过的一样——力图使每一个学生的专业基础更扎实,专业能力更强。实际上,这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而不是本科生的培养模式。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未来都想从事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社会也不需要所有大学毕业生都从事科研工作。更显著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不想也不会从事科研工作,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的科研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统计数据显示,各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从事本专业科研工作的比例不超过 10%。即使在科研领域内部,根据一项对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所学专业的研究,大约 85%的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也不是生物学专业毕业的。既然 90%以上的人毕业后都不会从事专业科研工作,为什么要按照培养不到 10%的科研人员的模式去组织本科教学呢?大学和院系为什



么要把全部的资源 and 精力投入到不足 10% 的人身上呢？为什么要让超过 90% 的学生成为不足 10% 的学生的“陪读”呢？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看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应当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将学校的大部分本科教育资源按照不是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超过 90% 的学生身上，而将小部分资源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不足 10% 的学生身上，各尽所长，各得其所。

历史上，美国顶尖大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议：本科教育应当采取和研究生教育同样的模式吗？大学所要招收和培养的学生，到底是以成为学者、科学家、大学教师或研究博士为目标，还是成为未来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如果是前者，招生时就应当尽可能挑选那些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后者，招生时除了要考虑学业成绩之外，还必须参考那些对于取得成功而言更为关键性的素质：动机、热情、坚韧、道德责任感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等等。20 世纪 60 年代，当美国受到苏联航天科技最强有力的挑战，对科技人员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时，对此的争议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顶点。但即使在那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也没有选择前者，而是坚定地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为大学的根本使命。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本科阶段，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活动，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热情、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提高他们对事物的敏感度、洞察力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等等。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而言，这是更为基本的挑战，也是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素质的要求。当学生走出校门时，大学给予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毕业证书、成绩单，还是别的东西？我曾经请几位大公司的 CEO 列出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最看重的素质，其中重合度最高的是：人品好、身体好、人缘好和想法多。至于大学和学生所最看重的考试成绩、英语熟练程度和艺术特长等，他们根本就不在意。面对如此之大的差异，大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去满足用人机构的这些需求呢？

弊端三：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指的是书本理论知识——许多实际上已经过时——过多，缺乏与实践生活的系统性联系。学生背诵了大量用来应付考试的理论、名词和术语，却缺少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理解和同情，甚至漠不关心。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许多学生对帕累托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勒纳指数和精炼贝叶斯均衡等模型和术语滚瓜烂熟，却看不懂一张基本的企业财务报表，这不是令人奇怪的现象吗？一学期 18 周的教学计划中，至少有 17 周是在教室里度过的，学生又怎么可能有机会了解到真实世

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脱离实际的教学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只会根据现成的理论、知识和数据去做外围性的辅助工作，却很难独辟蹊径、无中生有地进行开创性的领导工作。学生的学习、模仿能力很强，但提不出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一旦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或危机，则茫然不知所措。这是中国社会缺乏自主创新成果的根源，也是面对重大灾害时行动效率低下、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的确，在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很快把欧美的新东西引入国内，甚至因为中国市场的广大而取得比美国国家更大的成功和商业利益，但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提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比如 Google、Uber、Twitter，等等——让欧美发达国家来模仿中国呢？

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千方百计提供各种机会，增加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以 MIT（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它的核心理念是“关心真实的科技与世界”。教授鼓励学生提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想法，并动手把它做出来。有时候，教授会把学生丢到印度一个穷乡僻壤中，在没有网络、没有数据、没有资料、没有任何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要求学生研究真实的事件和问题。有趣的是，美国顶尖大学的课堂对笛福笔下的鲁滨孙特别感兴趣，常常要求学生设想如果自己处在鲁滨孙的环境下，应当怎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从对鲁滨孙的讨论开始的。

因此，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相比，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是，每一所大学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反思如何改善自己的本科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这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他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教育。社会机构也是一样。

（来源：《光明日报》2015-10-13）



高教视点

推进依法治校 依章管理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施建军

依法治校的本质、目标与基本原则

依法治校、依章管理大学的指导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依法治校体系。从当前情况来看，依法治校可谓意义重大，应全面加强学校各类人员的法律意识，提升他们的法律素质；从依法治校的要求看，现实中的大学也往往存在立法不足、缺乏章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也都显现出缺少制度管理、法治理念不强等问题。现代化的大学同样需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以提升学校的运营效率，维护校园的公平与正义，维护大学的安全稳定。一个大学的章程就是大学的宪法，我们要维护学校的公平与正义，要维护教职工和学生的权利，要维护学校的安全和稳定，就要遵守大学的章程。

依法治校的总体目标，就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章程，加强大学的法治管理，强化大学的法制保障，科学立法。大学的建章立制就是科学立法，有些人对立法的科学性不以为然，这就导致有些规章制度无法执行，人们往往会按照“我例外”的原则行事。因此，我们要先考虑所立的规章制度是不是良法，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制度规定，是否符合建立高水平大学的要求，是否大多数人都愿意去遵守。建立了良法以后，我们还要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有效实施是依法治校的重要保障之一。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只有在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加上公正司法，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守法，达成建设法治贸大首善之校的目标。

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原则。首先要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这也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我们在积极推进依法治校的同时，也要兼顾以德治校，德和法是两个层面上的概念，不犯法不一定意味着符合社会道德，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在规范法治纪律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让应有的道德因素参与进来，在此前提下，以法治思维来探索创新、真抓实干，促进学校的科学发展。有些问题还可能涉及到时间的迁移性、执行过程的科学性，要注意坚持两者结合，做到宽严适度，逐步过渡到严格的管理，实现依法治校的目标。依法治校，还包括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不可为。换句话说，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职责你必须履行，否则你就是失职。这一条是公务员行事的规则，在现代大学法治管理中同样适用。对于在岗位上的管理者来说，必须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除了制度内的行为，不能乱作为。任何人不能把权利任意放大，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办不成，正是因为一些人把自己手中的管理权力无限放大，职责内的事情却毫无根据地不作为。然而，许多权力的放大，实际上是为了寻租。有些人将服务岗位变成了管理岗位，把管理岗位变成控制岗位，认为自己可以从中捞到好处。因此，法无授权不可为，实际上是对于管理者的一个限制，是从严治政的具体措施。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

现代大学制度是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而产生。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既是国家现代化教育规划部署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体制创新的需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体制机制创新。例如：之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建立不规范，以行政指令为主，没有发挥教授的学术主导作用，对学术权力的规定也不完善。在制订大学章程的过程中，学校比较注重学位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关系、学术委员会与教授委员会的关系、学术委员会与人才培养委员会的关系。这些委员会如何张扬学术权力，如何真正发挥出学术自由和学术管理的力量，这是如何提升学校发展内涵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法律关系，法律主体就是教职员工和学生，用法律条文的行使给予保障，这是章程的基本内容。

依法治校，特别强调以章程来规范教职员工、学生的思维和学校的管理。管理要有章法，工作要有规矩，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有法治思维。领导干部要具有的法治思维，这也是我们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即我们头脑中是否存在法的观念、政策的边界、制度的边界。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碰触。凡事要在规定的程序与法律的权限内运行，提高高校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是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如何提高高校各级管理干部的法治思维，既是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更是推进依法治校的根本要求。中层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有法律意识。虽然不是搞法律的，但是大学各级管理者的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就是法治思维。一个有效的大学管理者，其法治思维必定无处不在；一个高效的现代组织，其规则制度和章程约束也必定样样具备。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规矩、规则办事，不要认为有权就可以搞定一切，这是破坏规则的非法治思维。高校管理者都要切记：千万不要以为权大于法！这就是法治思维概念所在。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决定了建章立制中的示范带头作用，高校各级管理者不能把规章制度不当回事，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



事实表明：一所大学领导的法治思维如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所大学领导力是否强、执行力是否好。

大学章程是立校、治校、管理学校的总制度体系，是引领学校发展方向的根本法、基本制度。大学章程本质上是大学四种权力的相互支持、制衡和约束，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必须有一部科学的章程，作为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制度规范，规范大学各类人员的行为标准。一般来说，大学的章程制度体现为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制衡和规范。有人说，大学是世界上最难管理、最复杂的组织机构，由于四种权力交错在一起。管理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权力碰撞、权力失位和错位。政党权力错位就会影响行政权力，干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错位就会干涉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影响大学学术权力的有效发挥；学术权力错位影响党的领导，方针政策的贯彻，导致组织涣散，民主权力过分扩大，会影响行政权力的效率，增大运行成本。高校对于各种权力都要有有限而合理的分工，大学章程就是对四种权力的有效运用。但同时，高校应该做一个合理规范的权力范围制约，以保证其自由科学的运用。因此，大学章程本质上是对其四种权力的规范约束，既要张扬各个权力，又要规划好各个权力的范围。

大学的科学发展需要构建一个和谐校园。大学章程还可以整合大学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大学校园。在自由和民主的本质要求下，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畴内，大学要为每一个组织成员提供自由和充分发展的空间，否则组织内部就会产生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章程的建立能够化解高校内的各种矛盾，凝聚最广大群众的力量，努力开拓学校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学校章程的制定与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学章程制定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全校各级领导、各部门管理人员以及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参与其中，通过几上几下的反复酝酿和讨论，经过学校党委会、教代会、工会以及党委全委会议决策通过，经教育部部务会议讨论批准，最终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学校在法治建设道路上，迈出的全新征程，在六十四年的办学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是广大教职工在依法办学上的又一件喜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应该是一个认识贸大、分析贸大、了解贸大的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凝聚智慧的过程，也是学校交流学习的过程。学校章程现在的核准稿共十章，包括总则、重要职能、管理体制与重要机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机构、教职员、学生的权利义务、学校与社会、资产经费、后勤保障、学校标志等，共七十四条。学校章程的制定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大学，特别是同类大学章程的有益成分，注重加强学校的制度建设。

其中，所谓的办学特色，就是回答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么办大学这两个基本问题。学校积极探索开放型大学的办学之路，提出以科学发展为统领，推进学校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办学理念。这次特别把国际化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是学校通过办学历史和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也是此次章程的特色之处。

学校章程对“三种关系”的确立与规范

学校的章程确立了三种关系。其确立的第一个关系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国家高校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但如何落实好、实施好，这确实是学校面临的难题之一。学校需要党委的集体领导，校长的行政领导，这两点很关键。前者，即党委的领导是集体决策制；后者，即校长负责是法人负责制。重大问题要放在常委会上决策，包括体制、机构设置、中层干部任免、50 万元以上重大资金、学校重大事项等都需要集体决策，这些决策更多为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而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上，要加强校长的行政指挥能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探索，能够有效地保证学校党政一体，在推进学校科学发展的路上，有分工、有合作、有沟通，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

大学章程确立的第二个关系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要相对分离、相互配合，学术权力在高校学术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学要张扬学术权力、加强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学，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

大学章程确立的第三个关系是凸显民主管理、完善民主管理和决策的制度体系。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校友会代表大会等多项制度体系，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强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组织合力，通过工会组织活动来加强全体教职工的凝聚力。另外，学校要加强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可以保证决策的民主和依法治校的执行力。凡涉及到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学校建设的重点问题以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都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这也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依法治校，就是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当前，高校信息向社会公开的内容越来越多，学校办学完全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管理。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完善民主党派的协商机制，健全民主决策，健全学术民主制度、校情民意的沟通制度，校务公开制度、学校重大事项的听证制度、民主的监督制度、维权制度等都需要落到实处。

学校章程的颁布与实施，是推进学校科学化管理、依法治校的一件大好事，希望学校各级单位和学院掀起学习、宣传和落实章程的行动，把大学章程印在脑海里、落在行动上。

（来源：《北京教育》2015 年第 7 期）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 吴志功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三性”之思

1. 国际性：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具有国际视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体现国际竞争力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学制度。它必然是面向高等教育的未来，面向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体现全球化时代世界高等教育管理高度、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制度。

先进的制度可以解放人性、释放潜力、提高效率。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伴随着西方教育体制改革兴起的，更有观点认为，现代大学制度肇源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教育理论和制度创新方面，国外的一些大学走在世界前列，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这些值得我们以开放的胸怀和国际化的视野加以学习、借鉴、吸收和转化，并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同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之所以被当今大学奉为主臬，就在于它是世界高等教育不断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汲取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精华，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当前，我国大学自主权的扩大为大学创新制度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国家也提出从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大学尤其应该站在世界及本国需求的战略高度，开拓眼界，创新求索，跟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做好有利于世界、有利于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学校自身发展的顶层设计，使学校在国际竞争中显现制度优势。

2. 历史性：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体现出历史延续性与发展性

首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扎根于历史的土壤。大学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大学制度同样要珍视和传承历史。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所尊崇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与生俱来，是现代大学的精神内核，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这一精神内核始终为众多大学矢志追求和全力捍卫，这种特质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舍弃；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经过一代代中国高教学人的探索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和共识同样值得承继。从清末开始，以蔡元培、郭秉文等教育家的探索为发端，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历经民国时期高教改革的初步探索、建国后的全面学苏、文革时期的干扰，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迎来其发展和完善的全新阶段，形成了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要表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制度要与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焕发活力。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大学制度



建设是分不开的,有许多优秀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化需要我们继续传承。

其次,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在历史的继承中得以发展。毋庸讳言的是,大学制度一经形成,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惯性,并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大学的保守性。大学的保守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双重的价值,既维护了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也曾阻碍了大学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大学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在发生变化,大学的职能和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规模的急剧扩张加剧了大学制度的裂变,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现有大学制度的部分内容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适应,必须有所扬弃。面对世界竞争逐渐进入以科技为核心的竞争态势,中国大学的改革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就必须坚持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打破惯性思维,创新制度模式,以有效激发高等教育发展活力。

3.现实性: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扎根中国现实,更好地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拿来主义的例子很多,但都没有成功。事实证明:世界任何大学的成功经验都不可复制,都无法全盘移植过来解决中国大学的现实问题,自己的问题归根结底需要自己来解决。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既要把对学术自由的尊崇和当代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学术自由、探求真理的现代大学核心特质,也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其成为理论、道路和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应该看到的是,现代大学功能的多元化、面临形势的复杂化决定了学校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大学制度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张力和活力,切实扎根本国发展实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问题,用多样灵活的方法破解制约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才以及学科发展中的难题和瓶颈。作为高教管理者,尤其需要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和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设计,改革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体系和内涵建设,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真正把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精髓体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以高等教育改革的优秀成果践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国际性、历史性、现实性出发,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路径

1.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四个重点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坚持国际比较、历史比



较的视角,根据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大学发展的阶段,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笔者以为,现阶段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有以下四个重点:

一是要制定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世界共识是法治精神、依法治校。章程体现大学的使命和治理结构,是大学运行遵循的“宪法”。制定章程既要体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体现依法治学的要求,也要站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高度,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大学,形成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以往大学的管理往往难以保持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包括在目标定位、理念规划、制度政策等方面,经常是换一个校长、换一个领导就换一种说法。以章程的形式对大学的管理进行规范和固化,将有利于形成学校的集体共识,让学校保持发展战略及自身文脉的延续,保持目标政策和文化特色的持久性。同时,以大学章程为依据,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事管理、科研管理和院系改革等方面建立一套细密完善、科学高效的规范管理体系,也将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要构建学校各项工作的标准体系。工作标准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是有区别的,它也体现着一所大学的规划和定位。为此,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应该制定切合学校发展实际的标准。例如:构建与时代要求、办学目标一致的高校党建标准和干部考核标准,集录用标准、考核标准、奖惩标准于一体的教师衡量体系,以及包括学分标准、体质标准、论文标准的学生衡量体系,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制定相关的学科标准、课程标准等。一个好的标准体系不仅会规范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也会促使教学和科研人员不断自我学习、自我完善,实现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的双提升。

三是要围绕学校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群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分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主要解决大学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相关问题。学校工作千头万绪,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很多,必须历史地看待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去解决问题。通过制度建设抓住主要矛盾,紧密围绕制约学校发展、事关学校全局的、能够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实施改革创新,切实围绕广大教职员工的利益相关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实施改革创新。例如:切实提高学术性组织的地位、明确划分不同权力组织的权力界限、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人事聘任制度改革等。

四是建立讲效果、讲效益的干部问责制度。现代大学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效果、效益的关注,并映射到管理实践中。问责制是对现代大学管理者的一种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它强调让责任“归位”,使监督“强硬”,对失职和渎职的管理干部一律追究责任,以正确处理大学管理中权与责的关系。因此,实施问责制,一方面要划分清晰的权责,合理地配置和划分管理权力,以及制定合理的进退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各项规划和任务都严格落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在责任和责



任人之间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映射关系,强化责任意识。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伟大变革中,学校管理应从传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模式向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问责绩效模式转换,以激发内部创造活力。

2.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六个要素

一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Problem),把世界、国家、行业、区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作为大学开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探究工作的逻辑起点,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今日的大学不同于以往,已经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的中心,随着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学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解决社会急需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大学的人才和智力资源成为科技竞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大学在做好制度规划时亦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与社会需求。

二是要把问题意识转化和凝练成可以操作的项目(Project)。项目是对现实问题的学术性转换,是解决问题的抓手和途径。制约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学术转换,分解为不同层面的问题,如制约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一般问题和常规问题,据此相应地凝练成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和常规项目。凝练项目,要立足于世界标准、中国特色、学校实际这三个维度,着眼于前瞻性与现实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把既定的奋斗目标转变为各级管理者的工作任务,进而推动大学实施项目化管理,突出效率、效益、效果。

三是要围绕解决重大项目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People)。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研究学问、探求真理的大学而言,人才重要,合理的人才结构更加重要。要根据学校事业发展的需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引进,建立合理的人才格局。人才引进不能盲目,要看他是否有助于学校完成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否有助于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人才价值的体现与大学目标、项目的实现,应该体现高度的契合性。只有共赢,才能实现人才与大学的共同发展。

四是要设计科学的模式(Pattern)。设计模式要结合世界的和历史的经验,探索出实施项目的路径,模式对一个项目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模式具有多样性,同样的一个项目,会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的沃里克大学,都被认为是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但是采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不同,最后形成了两种鲜明的发展路径。科学合理的模式应该是尊重每个合作者的利益诉求,力争使各利益主体实现共赢的模式。

五是要制定具有竞争性的政策(Policy)。现代管理科学对管理者的政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切实制定出具有竞争性的政策,才能有效激发师生员工的创造活力,保障学校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整体发展战略推进和实现,凸显大学的制度优势。

六是以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Product)为制度检验标准。成果是检验项目、模式



和政策这个综合体系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也是解决制约学校发展难题的关键。作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是否能够推动学校发展,正在于以管理工作的成果化,推动大学软硬实力的全面提升。

总之,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诉求。只有面向世界、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紧紧围绕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实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抓住重点,创新模式,最大限度释放学校的发展潜力,才能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来源:《北京教育》2015 年第 9 期)

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思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 柯文进

“管”:要以“清单管理”为抓手,向“有限政府”转变

实行清单管理方式是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手段。本届政府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组合拳作为落实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正如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的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上所指出的:一方面,要拿出完整的“权力清单”,政府应该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另一方面,要给出“负面清单”,政府要让企业明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法无禁止皆可为”;此外,就是要理出“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责必须为”。

1. “权力清单”表现为对大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具体来讲,“权力清单”方面主要表现为大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一直是集权化的政府控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控制模式有所弱化,但政府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高等教育管理的各项权力,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如项目评审、教育评估、人才评价和检查事项等。大学办学自主权有限,社会力量难以参与高校治理。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办学的行政干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才能防止公权滥用、减少寻租现象,使政府真正履行为高校、受教育者服务的职责。

2. “负面清单”主要表现为对高校、社会评价机构开展的监管工作

推进管办评分离,让政府简政放权并不是让政府将所有权力下放,更不能以简政放权为名放弃监管之责,而是要求政府真正承担起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角色,有效推行法律政策,有效实施各类监管。通过“负面清单”以形成公开透明、预期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高校和社会评价机构的创新活力充分迸发。一是要监管高校的办学行为,



这要求政府在依法明确和保障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制定禁止高校自主办学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乱收学费、砍掉冷门专业、功利倾向等。在此“负面清单”之外的事项,学校均可自主决定,并且要尽量缩减“负面清单”事项的范围,更多采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二是要监管社会中介机构的评估行为,实行“元评估”,即对评估机构评估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不直接参与评估。政府监管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组织评估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确保社会组织在运用评价权力时不会偏离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的轨道。

3. “责任清单”表现为政府组织的优化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升

“责任清单”管理要求转变政府的微观管理为宏观调控,将“掌舵”与“划桨”职能分开。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政府集高校办学者与管理者于一身,热衷于对高校内部自身事务的管理,样样包揽,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根据有限政府理论,政府的知识是有限的,政府知识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有限理性的存在,政府的功能也是相当有限的,而无限的政府干预一定会失败。为弥补政府大包大揽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监督政府的行为。在“责任清单”管理下,要求教育及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公报、官方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全面公开其组织结构、管理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优质服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在减少对高校微观事务的管理后,可以更好地关注和把握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方向与重要议题,如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确立高等教育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高等教育宏观资源配置等,进而提升宏观管理的水平。各级政府可依据“责任清单”的职能精简和优化原有的行政组织机构,促进权责统一、分工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办”:要以“大学章程”为统领,向“多元共治”转变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施行以来,教育部已核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部属高校的章程,北京市教委也首批核准了市属五所高校的章程。章程的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章程文本的制定只是“破题”,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任重而道远。下一步,要梳理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着力加强章程执行和监督机制建设,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

1. 以大学章程为统领,理顺和完善规章制度

大学章程是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大学章程对大学与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清晰的界定:对外,有利于赋予政府有限的权力,划分政府干预高校办学的边界,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施,大学章程也是自治的“宪章”,对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机制等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作出了规定,是大学进



行自治的规则和依据；对内，相对于师生员工来说，大学在行政法授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章程应对大学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范围、流程等进行规定。在大学章程的统领下，下一步的工作应是理顺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并完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资产与财务、后勤、安全、对外合作、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种办事程序、内部机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

2. 探索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治理(Governance)已成为 21 世纪大学管理的新趋势，各国纷纷设立董事会制度或加强其建设。美国加强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治理结构；英国新的教育立法规定 1992 年后成立的大学要设立董事会(Board of Governance) 和学术委员会(Academic Board)的两会制治理架构；日本 2004 年实施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大学治理由校长高管会 (Board of Director)、经营协议会 (Administrative Council)和教育研究评议会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uncil) 三大机构组成。由此可见，发达国家通过董事会来实现社会、政府、学校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高校的治理，并形成与学术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制约关系。我国当前公立大学所成立的董事会严格来讲并不是治理机构，而是一种类似于基金会性质的筹资机构，或者是一种产学研合作机构。结合国内大学董事会的现状与问题，对我国公立大学董事会建设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公众对高校公权力监督缺失的情形下，我国应以法律形式授予董事会审议权、咨询权与监督权；二是董事会的治理实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三是明确划分董事会与学校党委、校长等管理主体间的职能关系；四是董事会规模 21 人为宜，由政府官员 4 人，学校校长、书记及其他党委成员 5 人，校外专家 2 人，社会精英 4 人和师生代表 6 人共同组成；五是董事会成员以任命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六是董事会以定期召开常务会议和不定期会议的方式运行。

3. 完善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的舆论监督与问责

高校信息公开是推进 “社会评教育” 的信息基石。校务信息，是高校在实施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事务及其有关信息，涉及到学校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管理方式、学术意愿和实现模式。信息公开就是将学校的重大事项公开，让学校内部、学校外部的社会人士关心、参与和监督学校的大事，实现依法治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2014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制定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教育部直属 75 所高校在 2014 年 10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全面公开清单所列 10 个大类 50 条具体项目，同时要求地方高校和有关部门所属高校根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清单落实。目前，“985 工程” 高校中多数都已建立了信息公开的平台，但与英国、法国、美国相比，在权威性、完备性和操作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如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商业秘密等的规定



一直没有出台；二是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程度较低，如何落实及检验高校的信息公开成效仍然悬而未决；三是高校招生和财务的信息公开仍有待扩展和深化，特别是高考招生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招生条件、考试程序、评价准则与结果等招生制度的公开化。

“评”：要以“独立客观”为准则，向“社会评估”转变

教育评估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思潮。教育评估组织是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关系的“缓冲阀”，可以在政府、市场与高校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以应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情况下的困境。当下，我国的高校教育评估仍以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估为主，因此如何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开展独立客观的评估是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关键。

1. 健全法律运行机制，保障评估的合法性

我国与教育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普通高等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教育督导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中都尚未对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及其活动的法律地位给出明确的界定。因此，目前社会中一些独立性较强、且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发布的大学评价，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中国大学评价》，中国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高校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网大中国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以及校友会的《中国大学排行榜》等，都因缺少政策法规上的合法性，所发布的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仍受到大众质疑。因此，推进社会依法评价的第一步是要在该领域尽快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以支持和规范教育评估机构的发展。

2. 培育社会中介机构，保证评估的独立性

目前，我国的高校评价仍是采用政府集权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下的评估机构，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等。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管理理念，评估机构必须独立于政府，这样才能够保证高等教育的评估不受政府意志的影响，从而保证高等教育教学与学术的自由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都倾向于利用非官方、独立的社会评估中介机构进行大学评估。在荷兰，非官方中介机构‘荷兰大学协会’负责对高等院校的教育评估工作；在韩国，作为高等教育主要评估机构的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是韩国唯一的大学民间团队”。政府在评估中的作用甚微，一些政府的官方机构只是进行“元评估”，即对评估机构评估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不直接参与评估。

3. 评价手段、方法要科学规范

我国评估中介组织在现阶段的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制约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国外关于高等教育的评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高校投入产出的系统评估，这类评估要求学校建立完善的信息数据库来保证信息的充分与准确，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的高校绩效评估。另一类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这类评估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如经合组织（OECD）开发的高等教育



学习成果评价项目 (AHELO), 该评估项目包括对“通用技能”“经济学”“工程学”三个方面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评, 目前已有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17 个国家决定参与这一国际测评。我国高等教育社会评价中介组织应在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已有评估方法和技术的同时, 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 努力研究和探索新的技术方法, 积极创造并使用新的工具和手段, 建立起各级高等教育管理信息数据库及网络系统, 并探索开发对大学生学习成果的测评工具。

4. 评估组织的专家构成应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评估组织的成员水平及构成是影响评估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评估组织的专家构成应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体现公众意志, 实现社会对高校的问责。专家组成中: 一是要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熟悉高等教育的理论前沿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为评估的导向性指明方向; 二是要包括社会各行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企事业单位的精英人士, 可以对高校毕业生质量作出客观的评价; 三是要有掌握评估技术的专家, 保证评估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来源:《北京教育》2015 年第 9 期)

从“教授治学”到“师生治学”

——兼论中国大学治理的法治化与民主化

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 任羽中、刘一鸣

近期, 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公布了不少高校的章程, 依法治校、依章办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和努力方向, 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在部分高校章程中, “教授治学”或者“师生治学”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两种理念以及所体现的大学治理模式之间有着共通之处, 但也存在张力。相较于具有深厚历史脉络的“教授治学”而言, “师生治学”是新近提出的理念。

从“教授治学”到“师生治学”: 大学治理理念的变化

“教授治学”来源于“教授治校”, 而后者作为大学内部最根本的治理理念与模式, 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大学。面对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 巴黎大学借鉴中世纪城市手工艺人的行会制度, 建立了“教师行会”, 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大学内部事务, 如课程设置、招生、选举校长和聘任教师等。19 世纪, 德国洪堡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 在“大学是由参与真理追求的师生组成的学者共同体”理念指导下, 逐步实现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大学发展模式, 并组建教授会, 大学的各项事务均由教授会决定。依靠先进且科学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 德国大学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而“教授治校”的理念和模式也成为“各国大学之通例”。



蔡元培先生“循各国之通例”改造北京大学时，将“教授治校”引进中国。通过组建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大学内部的行政事务、学术和立法工作得到比较明确的区隔，大学的权力在各个层面得以合理分配和运行。蔡元培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旧北京大学的官僚衙门作风，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但“教授治校”并不等于教授要直接参与学校的一切工作，除了学术权力之外，大学显然还存在着行政权力。因此，比“教授治校”更准确、更清晰的表达是“教授治学”。2010 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第十三章明确提出：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2012 年 1 月 1 日实行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十条中又规定：“章程根据学校实际，可以按照有利于推进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有利于调动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原则，设置并规范学院(学部、系)、其他内设机构以及教学、科研基层组织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据此，目前共有 62 所高校经教育部核准公布了大学章程[3]，其中有 43 所高校在章程中明确提出了“教授治学”。

相较于“教授治学”，“师生治学”却是比较新近的理念。在 2012 年召开的北京大学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党委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治校理教水平”。2014 年公布的《北京大学章程》进一步明确“学校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依法治校，实行现代大学制度”。此外，复旦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的章程明确提出了“师生治学”。“师生治学”的提出，反映了大学治理理念的重要变化，它脱胎于“教授治学”，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师生治学”继承、拓展并深化了“教授治学”。

“师生治学”的时代背景与内在理论

1. “师生治学”是推进大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从历史上看，大学曾经以教学为主要任务，主要功能是培养人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到 19 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崭新理念，强调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对德国的大学办学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高等教育也受到洪堡思想的深刻影响，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但随着以教学为中心转变为以教学科研为中心，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思想认识到具体考核、管理等方面“见物不见人”的偏差，特别是目前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成果越发重视，但对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内心世界的和谐安宁却越来越忽视。在一些大学里，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淡漠，变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大家为了创造有形的“产品”，如论文、专利等结合在一起，缺少了精神上的高度认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和谐统一，大学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相长、情深意笃的优秀历史传统逐渐丧失。

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真正形成“以立德树人为办学之本”的共识，把焦点对准



“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从高校教育和管理的对象,转变为大学治理的主体。教师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是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是学生自觉、自主的成长过程。因此,让学生参与到大学的治理,特别是学术权力的运行过程中,由教师的“单主体”拓展为师生的“双主体”,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更加自觉自省地修身树德、成长成才,在与教师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实现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师生治学”是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主体回归的重要举措

早期的大学作为师生探求高深知识的机构,其管理人员皆由学者兼任,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管理和谐互融。但随着大学规模扩大和功能拓展,专职行政人员开始出现,且行政权力开始与学术权力分庭抗礼。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纯行政管理观念逐渐淡化,但仍带有浓厚的“科层化”特征,“从学校内部组织的纵向关系上来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行政控制关系;从横向关系来看……由于这些部门掌握着分配办学资源的绝大部分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泛化现象”。这就导致师生缺位于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降低了他们对学术管理的认可度,影响了师生在学术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为实现学术决策的科学性和健康发展,就必须重新确立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活动主体地位,师生主导学术事务决策和治理。在学术事务的治理中,教师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授者,具有无可争议的主体地位;而要全面实现对学术事务的科学治理,还必须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从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看,尊重学生在学术科研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是有历史积淀的。蔡元培在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时提倡“完全人格之教育”,废学门改学系,取消学程制,改为选科制,使大学教育更好地适应学生,努力唤醒学生的主体自觉意识。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职称评审、学位授予、学科建设等是发挥学术权力的主要阵地,教师在其中应该发挥核心作用。但在实施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培养环节等方面,除了教师外,学生也应参与其中,主要发挥的是类似于用户体验反馈的作用。此外,学生在学校中既是主体之一,又是被服务的对象,所以地位较为特殊。如果我们秉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么学生和教师都应该成为研究学问的主体,这也是高校治学的应有之义。

3. “师生治学”是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学校的实践路径

“师生治学”是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相对于“管理”而言,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强调不同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和沟通,以实现共同治理。因



此,在大学治理当中,治理的主体包括了行政管理者,但主要还不是行政领导,“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已很明显”,“传统大学制度在理论基础和实践上比较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在哲学上遵循‘一元’逻辑;或强调各权力和利益要素的‘混合’,是一种‘混合’逻辑。现代大学制度要成为‘现代’的大学制度,必须是‘多元’逻辑,且其权力和利益要素不应是关系不大的‘混合’,而应是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教师在治理中的作用已日益得到重视。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曾经比较过几个概念,他认为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师生治学,都不如教师治学更为合适,“就好比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病人并不知道如何治病,学生也并不清楚他们应该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所以治学是教师的事,尽管学生可以参与意见,但不能参与定战略、作决策。因此,学生是学院外部治理的一部分。”教师(尤其是教授)群体的确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却并不能因此忽视学生——这一学校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正所谓“教学相长”,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是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过程。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信息接受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甚至逆转了。无论是在教学活动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以及学校内部的一切治理行为中,学生群体的参与都是极其重要的。学生创造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也改变着大学的政治生态,尽管学生群体比教师群体的流动性更大,但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却有可能高于教师群体,他们当然有权利参与“定战略”,也一定会对决策的最终形成和执行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也在我国的政府文件和大学章程中得以体现。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北京大学章程》提出以师生为根本;《清华大学章程》提出以学生为本、学者为先。既然是“本”,当然就必须是治理的主体,“师生治学”相较于“教授治学”或“教师治学”,将学生明确为与教师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体,从权力结构上赋予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因此,教师不是治学的唯一主体,师生双主体的理念值得提倡,也符合大学发展的现实与未来趋势。

“师生治学”与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

法治与民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推进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实现法治化和民主化。法治或曰法律之治(Rule of Law),指的是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在法律之外不容许其他平行或更高的权威存在的原则。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的治理也必须体现法治原则。大学章程虽然不是法律,但却在大学治理中具有“法”的权威。就民主化而言,蔡元培曾提出:大学的管理应该是“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责。”问题的关键在于“议事”怎么“取公论”,这也是大学治理民主化的核心。

在大学治理中,法治化和民主化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化的过程在大学治理中



突出表现为有关教育的法律的制定及以大学章程为代表的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必然遵循着民主的原则。同样,民主化的过程在大学治理中主要表现为处理各种事务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这种规则必然是依据某种法律或规章制度。所以法治化为大学治理的民主化带来“合法性”,民主化为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带来“正当性”。“师生治学”可以比较好地克服单纯强调法治化或民主化取向的片面性,实现两者的相辅相成。要实现大学治理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有机统一,就必须落实“师生治学”。

大学治理的法治化不意味着有了好的法律和章程,大学就一定会治理好。现代大学的治理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不同的人、群体、集团、组织都会参与或影响大学的治理。这要求对大学的不同层面、不同问题进行规划与协调,以便实现大学治理的合理性。而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内部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只有使其真正成为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才能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使依法治校得以顺利推进。

在民主化方面,“多数决可以有‘合法性’,却未必有‘正当性’。”一旦民主的正当性出现问题,那么民主化就不能为法治化提供正当性的基础。而一旦法治化不再具有正当性,那么就会出现民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情况。民主的多数决不能是绝对的,它的运作形式和实现机制应该是有层次的、多样的。因此,适宜的“师生治学”模式应是充分考虑不同事务的特殊性,以及教师和学生各自特点的制度设计。倡导“师生治学”,绝不是要用学生来取代教师,而是要使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都得以充分发挥,以共同实现对学校的“善治”。

落实“师生治学”的政策建议

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需要长期的付出,需要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要“扎根中国大地”,在现有的制度土壤之上自然生长出来,要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快速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大环境结合起来。

1. 充分践行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因此,践行协商民主是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协商民主更多地注重民主的过程,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具开放性、也更加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普通民众因感觉到自己对决策无能为力而出现的政治冷漠。”同时,避免在作具体决策时,陷入无休止的讨论和争斗中,使得大学治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从具体情况看,协商民主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决策前,学校可以通过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会等组织广泛征求意见;决策中,学校可以通过校务委员会进行民主表决;决策后,全校师生可以通过各专门委员会对决策的具体实施进行监督,等到出现新问题时再不断通过此流程进行协商。各类专门委员会应该根据情况尽量吸收学生代表参与。

2. 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



学术委员会是“师生治学”的核心平台，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等，完善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学术委员会的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以制度的方式将教师和学生的治学权利固定下来。例如：《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确立了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负责学术立法、学术评定和学术审议工作，保障学术权力依法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首次明确学生委员进入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学生委员以及非职务委员占绝大多数，教授委员和学生委员均实行选举制；设立专门工作委员会，将现有各学术相关委员会，如学科规划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纳入学术委员会统筹管理，规范学术公共行动，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通过《学术委员会章程》，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切实保障学术委员会有效发挥作用。

3. 改革科层制管理结构

现代组织变革的趋势表明：动态性与灵活性的加强将成为组织未来发展变化的首要特征。这就需要推进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缩小和消除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师生的来源构成更加多元，加之高校学科多样，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师生各有其特点，管理时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相对灵活的方法。因此，要实现“师生治学”，首先应理顺校级和院系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构建合理的权力分配体系，保证师生拥有相应的权力来履行职责，激发师生自主寻求发展的动力；要通过对科层制的分权化、扁平化改革，减少师生信息沟通的组织层级，保证为师生服务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4. 鼓励师生参与校园公共事务

要使“师生治学”在大学治理中得以持续有效的扎根，就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师生治学”创设有利的文化环境。担任领导职务的管理者或者掌握审批权的管理机构，与师生员工之间在工作程序上不应该是一个由上到下的控制系统，而是集中集体智慧研究制定学校发展目标、然后鼓励师生根据目标对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并自觉自主工作的过程，所以要强调团队合作和人人参与，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要加强学生自组织的建设，培育并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各类学生自组织参与到学校事务的治理中。

大学本来就是师生紧密相连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了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师生应该成为大学这个“城邦”的“公民”，积极参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这不仅是大学良好治理的基石，也是大学培育现代社会合格公民所必须进行的训练。

（来源：《北京教育》2015 年第 9 期）



高教评估

中国高教评估首次走出国门：“新”在哪

国庆期间，受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的正式邀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首次走出国门，远赴俄罗斯对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的 4 个专业进行中俄联合专业评估认证工作。这也是我国首次走出国门，用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国外大学进行评估认证。

这一消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一提到“高教评估”，国人所给予的负面评价还是很多的。如今，曾饱受诟病的高教评估却开启了自己的首段海外之旅，也难怪很多人都连呼“没有想到”。

新发展

据悉，此次评估的邀请方是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这是俄罗斯国家级评估认证权威机构。而评估中心与该机构的合作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2014 年 9 月，评估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心就与俄罗斯国家公共认证中心、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高教认证“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些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整体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在评估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话语权。这样一来，我们在评估中的国际合作交流就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如是说。

事实上，国内高教评估多年来也一直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但此前更多的是引入国外的评估标准和体系，如参加国际认证协会，一些工程类专业也试图按照国际标准对专业本身进行认证，“这是前一个时期的表现”。

自然地，此次评估中心走出国门，也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作为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始进行新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就包括了评估思想、评估标准、评估技术以及选派专家走出国门等多方面，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国际化的新发展。”别敦荣说，只是这种新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更快地到来了。

对此，教育部也表示，俄方主动邀请我国对其大学进行评估认证，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中国模式、中国标准正在被国际认同和采纳。本次赴俄评估开拓了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新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



新角色

虽然我国的高教评估今年才首次走出国门,但在国际上,国家间的教学评估合作其实并不罕见。比如加拿大的很多高校会参与到美国的评估体系中,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国家中也比较常见。而此次俄罗斯主动邀请中国评估专家参与专业评估,其实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西方国家不同,很特殊。而欧美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和认证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民间性,政府组织的权威性不足。但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权威性很大,加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我国有很多相似性,因此,中俄之间开展高等教育评估合作就有了一种共同的基础。”别敦荣说。

此次远赴俄罗斯,评估中心共选派了 8 名评估认证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对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的 4 个专业进行中俄联合专业评估认证工作。参与此次评估的专家均有丰富的评估经验,但即使对他们而言,这次评估也有着全新的体验。

因为他们的“角色”变了。

“在国内,由教育部主导的评估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评估者和被评估者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而走出国门后,他们的身份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第三方机构’。”采访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这样的身份改变,对于尚处发展中的中国高教评估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挑战,毕竟面对陌生的评估环境和评估者的需求,评估者本身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在国内常常是不必要的。

除此之外,这种身份变化也带来了机遇。

在别敦荣看来,在国内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中,教育部的评估是具有官方权威性的。但走出国门、蜕变成纯粹的第三方后,评估中心应该会从中得到很多新的感受,从而更有利于思考在国内如何发挥第三方的作用。这可能是此次跨国评估最为积极的意义。

“俄罗斯高校并不认为我国的评估中心能在资源配置以及各种政策导向上对它们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与国内是不同的。这对于评估中心的身份是一个考验,对评估中心将来完善相关的制度也会很有帮助。”别敦荣说。

新方向

当中国的评估专家走出了国门,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外国的评估专家是否也可以走入国门呢?

“既然你能走出去,为什么不能让别人走进来呢?”储朝晖说,在目前国内普遍



对本土的高教评估缺乏信心，且独立的第三方评价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有其必要性的。“在教育评估的问题上，相较于‘走出去’，‘引进来’的难度要更大一点，但这种难度的背后，依然是我们自己选择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如果选择开放，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是有过“引进来”的先例的。据别敦荣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ISO900 质量认证体系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相关机构也曾来到中国，为十几所高校进行了认证。但近 20 年来，虽然一些高校引入了某些国外的评估标准，但已经很少有国外机构直接为国内高校进行评估和认证了。

“公办高校在请国外认证机构来华参与认证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有少数高校即使基于内部需求作了一些探索，也是在主管部门有意识的支持或默许下进行的。”别敦荣说。

在他看来，高教评估方面的“引进来”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别敦荣表示，高等教育制度跟企业制度并不完全一样，前者的文化性因素要更加明显。“英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差别是全方位的。”所以国际合作型的评估更多地是在标准和技术层面上相互借鉴。真正请某个国家去为另一个国家做一个系统化的评估并不现实。“这种评估模式应该发展，但一定要考虑国情。”

对此，储朝晖也表示，在高校评价方面，欧美国家依然具有相对的领先优势。我们要尽可能地向一些走在前面的专业组织学习，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的标准、项目问题不难模仿，但其背后的理念问题，在短期内却是很难有大的改变的。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是在一些动作上的探索，我们需要在理念上进一步反思。如此，中国的高教评估才能得到更广范围的认可。”储朝晖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5-10-15）



他山之石

探索个性化人才培养途径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访谈录

10 月 5 日, 85 岁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凭借青蒿素治疗疟疾研究, 和另外两名科学家分享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次获奖在令国人自豪的同时, 也引发对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高等教育该如何做, 才能真正培养出适应国家需要、推动科学进步、引领社会潮流的领军人物、杰出人才, 培养出适应 21 世纪全球化竞争的拔尖创新人才?

今天, 距离这个“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已有 10 年。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问题, 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创研究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路径。

陈骏认为, 在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的当下, 仅依靠追踪前沿问题做科研, 无法培养出真正一流的创新人才, 无法支撑起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他提出, 在教学科研领域, 国内高校应有根本性的转变。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取代论文导向, 从实验现象中发现问题, 从前人成果中提炼问题, 从社会需要中寻找问题, 真正完成科研导向的转变; 聚焦国际前沿,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通过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提升科研水平, 锻造创新人才。

过去十年, 南京大学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探索。围绕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这一目标, 该校调整了学科布局结构, 改革了科研资源配置模式、科研平台管理模式、科研团队组织机制、科技评价体制机制。同时, 学校力图以改革激发活力, 着力打破制约创新活力迸发、影响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 开创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比如, 从 2009 年开始, 南京大学在本科生中实施“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改革按照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径, 赋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 打破院系壁垒, 开放课程平台, 从而探索出一条个性化、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途径。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2 级本科生程宇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进入南大后, 他被学校“拔尖计划”选中, 获得破格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将进入医学院继续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成为“三三制”的受益者。



“本科生驻院研修项目”是南大“本科生学科交叉研究计划”的首个项目，也是学校继续推进“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的一次探索与创新。该项目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体验，推行“导师+小组”模式。每名导师指导不超过 5 名学生的学习小组，而学生以“青年研修者”的角色，在导师指导下，对感兴趣的学术领域进行自由探究。

与此同时，将世界级学术大师请进校门、点燃学子心中的理想之火可谓是南京大学一贯的培养人才的“大招”。比如，最近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学子们交流了创新创业话题。此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高研院院长周宪等知名学者与首批入选学生进行了交流。

陈骏表示，教师的原创研究水平越高，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然越强。只有实现科研转型，切实构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研、研中有教、教研相长，真正破解长期困扰中国高等教育的“钱学森之问”，为民族复兴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支撑。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5-10-13）

如何高效提升医学临床教学质量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学生要成为合格的临床医师，必须经过长期扎实、规范的临床实践，因此，临床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医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性环节，直接影响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近年来，长沙医学院围绕更新教学理念，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的目标要求，将临床教学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首先，临床教学基地是临床教学的主要阵地，为此，学校在大力投入基础医学教学设施建设的同时，还积极拓展对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针对培养基层合格医生，学校借鉴首都医科大学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模式，确定了到县级综合医院培养农村医生的方案。同时，学校在湖南省卫生厅的指导下，去选择病人床位多、病种多、病源多、医疗设备好、技术力量强、学生实践锻炼机会多、整体水平高的市、县级医院，签订合作合同，共同加强师资队伍、现代化多媒体远程教室、技能培训室、学生宿舍、运动场地等建设。对综合条件好、建设成效明显的医院，在通过由省卫生厅、教育厅组织的专家进行评估后，联合下文确认了湘乡市人民医院等 18 所医院为长沙医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满足了学校临床医学专业



临床教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利于学生熟悉和适应基层医院情况,为他们今后在基层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学校择优遴选了 60 家实习医院、17 家社区(或乡镇)医院、7 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的临床学习,全科医学和预防医学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提供了稳定的基地。

在拓展临床教学基地的同时,学校还采取重点建设直属附属医院,带动非直属附属医院全面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政府、学校、教学基地三方利益相结合的优势,成功建立了保证临床教学质量的政策和质量控制体系,促进了临床教学基地综合实力的提高与持续发展,有力地保证了临床教学质量。

学校通过常设管理协调机构,对附属医院的教学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成立由主要领导、非直属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院长组成的临床教学管理委员会,并将办公室设在学校教务处。教务处主要负责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的教学建设、教学管理和总体协调工作以及计划拟订、任务下达、教材发放、教学检查、质量监控等工作。同时,教务处通过设置实践管理科,由 4 名专职教师来负责基地建设、临床教学管理与协调工作。而对于各非直属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长沙医学院则成立临床教学领导小组,由医院院长任组长,书记、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长任副组长,科教科(部)科长(主任)及教学督导为成员,在医院管理上实行教学院长负责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科教科(部)科长(主任)任主任,并配备 1 至 2 名专职干事。各医院也通过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教研室,并由各科主任担任教研室主任,各科总住院医师担任教研室教学秘书。明确了由医院科教科(部)来负责临床教学管理与教学档案工作、协调学生后勤工作,落实教学任务、编排教学进程、安排学生轮科、学生课外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与监控教学质量等工作。而教研室则负责理论教学、学生带教以及日常教学管理工作。此外,学校还派遣专人常住非直属附属医院与教学医院,负责学生工作与医院临床教学协调工作,检查临床教学质量,帮助院方不断改进工作。

为了不断健全教学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学校还与各附属医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办法,“六步战略”的实现促使临床教学工作形成了“检查-反馈-改进-建设-检查”的循环运行机制,使得全面质量监控得以有效实施。

第一步是打好基础。学校通过强调临床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不断提高全员教学质量意识,通过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各教学环节质量控制,打下临床教学高质量的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础。

第二步是统一标准。学校统一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教学大纲、见习大纲、考试



大纲、教学日历，采取考教分离，统一阅卷。并及时将学生考试成绩、试卷分析情况，反馈给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不断改进教学工作，确保教学高质量。

第三步是教学督导。每个医院由学校聘请专职教学督导，常住医院，全方位开展教学督导。同时，学校每学期组织专家组到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教学检查，听理论课、见习课，进行理论考试、操作考试、检查完整病历书写的情况，召开学生座谈会、老师座谈会，广泛收集意见，并及时向医院与学校汇报，协商解决所存在的问题。

第四步是定期检查。学校教学检查组每学期到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期中、期末教学检查，听理论课、听见习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老师座谈会，广泛收集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第五步是远程监控。学校和医院利用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讲课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在校内就可以直接掌握各附属医院老师和学生的上课情况。

第六步是网上评教。由学校评建办公室和临床学院每学期共同组织非直属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见习学生，对所在医院教师理论和实践教学质量进行网上评价，通过对授课教师采取优胜劣汰的办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何建军 张炯宇 曾昭伟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2015-09-30）



国际视野

中外大学校长怎么看大学排行榜

10月1日,天津大学举办“大学校长圆桌会议”,庆祝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美国莱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17所海外院校以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28所中方院校的100余名代表与会。

嘉宾围绕“大学的精神与使命”主题,从“大学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大学的机遇与挑战”“大学治理创新”三个方面展开交流讨论。虽然“大学排行”不在圆桌会议的设定议题中,但这无疑成了全天绕不开的话题。不少校长原本的演讲与此无关,听到其他同行谈及,也会“顺便”就此谈一些看法。校长们都表示,大学排名的高低实际上影响了学校资源的获取。

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规模大小、论文篇数、资金支持力度还是大学排行榜的高低?莱斯大学校长李达伟说,莱斯规模较小,排名上容易“吃亏”。他不无担忧地说,追求排名只会让越来越多大学趋同,并忘记自己的特质。每个大学都应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学排名还是学校规模,都与大学精神无关。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士也认为,目前同行们最大的任务是保持大学的多样性,而不是被一把尺子、一种评估或者一个大学排行榜弄得趋同。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大学一定不要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迷失方向,要有定力,有洞察力,要对自己的发展有信心、有意志力,锲而不舍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为之长期努力。

“我们一定要能理解究竟什么是一流。不能排行榜上把你排行在一个什么位置,你就断定自己是一流还是什么。我觉得,‘一流’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还是你能为科学、为文明、为你的国家和民族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朱崇实说。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用一个“笑话”描绘了被大学排行榜“绑架”给大学发展带来的危害:“大家都知道狮子是森林之王,别的动物都要向狮子学习。若干年后,除了狮子还是狮子,其他动物都成了疯子。”这个“笑话”,引来了现场校长们的笑声。

“很多时候作为校长,我们不得不因为现实的问题,因为要为学校谋发展等问题而‘功利化’。”一位中国校长感慨。席间有校长提出,当今的一些大学正在走向“标榜高尚”却实行“功利教育”的精神与实际“游离”的状态,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为了就业率沦落为“职业培训学校”。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指出,大学的确面临许多现实的压力,包括办学资金等。但我们还是需要点“精神”,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不能放弃理想。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表示,较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和学生,二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教授们培养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和高效的服务。在中国,大学与社会紧密结合,把知识创造和服务国家有机统一,应该是大学的价值目标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路径。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让学生真正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能够成为他自己,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对于大学精神、价值观,各个学校虽然有不同的阐释,但实际上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诚实、诚信、自由。事实上,很多大学的确是在讲一套做一套,比如希望学生有很大创造性,但实际上却把学生管得很死,无法让学生自由地发挥潜力。这是中国大学需要改变的地方。

朱崇实指出,大学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怎么让我们的人才更有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大学的使命之所在。为此,要培养学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要给学生宽松的氛围,容忍失败。要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给学生创造自由、独立能质疑的环境。

林建华对“世界一流”有自己的标准。他对记者说:“一所好的大学,其实你不用去看什么排名,你只要进去和老师、学生谈一谈,听一听他们在想什么、怎么想问题、想什么问题,你就知道这所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10-0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大学,在创新中求变

在今年 8 月出炉的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 2015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工科在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中位列第 11 名,前 10 名中有 9 所都来自美国。

南洋理工大学凭借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坚实基础与强大优势而享誉国际,并在全球 50 所顶尖年轻大学的排行榜上荣登榜首。

在中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已与 30 多所中国高校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备忘录和联合实验室。近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瑞典著名植物生物化学家安博迪(Bertil Andersson)教授就当前两国教育热点话题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帮助学生创新创业

《中国科学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高校学生也将成为这一潮流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高校出台办法,允许学生休学创

业,用各种实践成果来折抵学分等。南洋理工大学在这方面是否有经验?

安博迪:新加坡一直注重创新和创业精神,大力投资支持教育和研究。总体来讲,亚洲各国的创新能力仍然落后于欧洲。亚洲的学生可能有点照着流水线走,家长过度注重成绩。在瑞典和许多欧美国家,最具创新性的学生并不一定是尖子生,但他们富有创造力。一些欧美学生会休学一年专注创新创业。因此,如果想要发展创新,就需要家长、教育者和政府的思维模式转变。某种程度上,各国追求的充分就业也可能是阻碍创新的因素。毕竟,做员工总比自己开公司要舒适得多。

为了保持科技先进性,南洋理工大学与劳斯莱斯、宝马等跨国企业都有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学校师生都可以参与到产业项目中,确保学校课程不仅是最前沿的,也可以满足产业需求。作为全球一流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开展各类项目培养和鼓励创新创业精神。我们将学生送到国际枢纽如硅谷或伦敦,让他们体验其他国家的创新机制。我们也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课室以外的知识。

在过去 5 年中,南洋理工大学每年平均会接到 330 份暂时休学的申请。他们在这期间实习、开公司,或代表国家、学校参加体育竞技等赛事。作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暂时休学的年限最多是三年,但这并不包含在学生在校累积学习年限之内。南洋理工大学也通过全资子公司 NTUitive 支持师生创办企业,帮助他们将创新成果商业化。截至 2015 年 3 月,南洋理工大学共开办 44 家公司,其中 13 家由教授创办,31 家来自学生。

同时,南洋理工大学拥有世界级的先进设备推动创新创造性。学校新建的学习中心拥有 56 个智能学习课室,专门为合作性学习和互动而设计。一座座高楼上点缀着阳台和花园,为师生畅想未来、碰撞火花提供了大量的互动空间。我觉得表达创意需要自由,创新也需要时间。虽然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我们并不能构建创新,只能努力培育创新的沃土,在创新中求变。

大学走向教育国际化

《中国科学报》:国际化是目前中国高校聚焦的一大目标。您认为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水平的参考指标或特征是什么?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国际化?

安博迪:国际化是知识的关键。古往今来,当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真的会促进人们扩展知识。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就是很好的案例,他们引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高校必须要国际化。我有时觉得瑞典、法国等很多欧洲高校过于国家主义,授课和发表文章都用自己的语言。但当前国际通用语是英语,因此这种做法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

新加坡高校在国际化上走得很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多文化、以英文为媒介的教育。包括交换学生在内,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自 100 多个国家,教研人员来自 70 多个国家。实际上,南洋理工大学在全球最具国际化的高校中排名第十,已经形成了

真正的国际化环境。

中国目前有很多留学生走出国门,但同样重要的是,各国的学生和教授也能来到中国。如果只有中国老师和学生,那么他们就是在重复欧洲高校的错误。

《中国科学报》: 您认为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MOOCs)的蓬勃发展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

安博迪: 无论是新加坡、中国还是欧美,都无法忽视慕课所带来的全球教育新趋势。这是在我进入职场以来所见证的高等教育传递方式中最大的改变。人们已从约翰内斯·古腾堡时代跳跃到比尔·盖茨时代,从印刷机技术跳跃到信息通信技术(ICT)。

今天,教师不是年轻一代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互联网、ICT和计算机可以带给他们很多信息。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了解全局概况,并对知识进行梳理和整合。

因此,在南洋理工大学与帝国理工学院合作新建的李光前医学院中,我们就没有设置常规性的讲课。所有内容都在平板电脑上,最重要的“教授”就是iPad教授。学生在课前阅读笔记,然后直接进入导师的辅导课、实验室和小组讨论。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学习方式。

然而,我并不认为慕课会代替大学的存在。我相信混合式学习,也就是融合面授教育、基于ICT的教育和慕课的学习方式。这些对国际化来说都很重要。而面向未来,我认为大多数慕课都会以英语或中文进行讲授,这是中国应该注意的一点。

慕课和其他基于ICT的教育也将有助于继续教育,特别是在职人士。对有家庭和被工作缠身的学员来说,慕课将方便他们在家里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现在已经在国际著名慕课平台Coursera上开设了三门课程:“美、形式与功能:对称性的探索”“法医学入门课”以及“电子商务基础”。这三门课程仅在去年就吸引了15.6万人报名,大多数来自亚洲,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其中有些课程计入学校学分。今年,南洋理工大学还将推出第4门课程“儒家哲学的探索”。

高校的核心是“人”

《中国科学报》: 中国高校以发表论文数量、承担项目数作为确定教师发展、晋升、奖励的重要依据,对此评价褒贬不一,您认为怎样是比较科学的评价机制?

安博迪: 高校教研人员有两项任务,教书和科研创新。因此,需要同时评价两个方面。对科研来说,评价重点一直是学术出版作品和引用率。但不要局限于统计数据,不时进行外部同行评议也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如何评价交叉学科研究,也存在诸多挑战。因为期刊和学术作品往往都以学科分类呈现,因此很难对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行有效的评价。但是未来的挑战如此复杂,我们需要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目前,我并没有看到做得很完美的评价体系,但高校必须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评价,因为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高校的核心是“人”。



《中国科学报》：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中国教育部工作重点之一，并在去年 10 月份出台了包括俗称“红七条”的若干底限，包括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不得索要或收取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高校存在的一些严峻现状。南洋理工大学是否有类似政策？

安博迪：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极为重要，南洋理工大学对于剽窃和造假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学术界和高校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失去对科研诚信的控制。因为每出现一次造假事件，公众就会对高校失去一份信任。

当前的职场压力可能造成有些人想走捷径。但是，所有高校都应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一旦发现剽窃和造假，严惩不贷。2010 年，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科研诚信大会，发起并通过了《科研诚信新加坡宣言》。我们也对学生强调科研诚信，自 2010 年起开始使用防剽窃软件，引导师生采用恰当的引用方式，确保科研工作的原创性。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5-10-08）

日本将迎来人文学科大削减

最近，日本教育部长下村博文急于调整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声称需要那些“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更实际、更职业的教育”。由此，超过 50 所的日本大学即将缩减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系规模。这种改变引发全球学术界的关注，有很多人发出了相反的声音。

令人震惊

“这太令人震惊了。”英国卡迪夫大学的英语讲师索非亚·哥伦布表示，“关于社会真正需要什么，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英国利物浦大学法学院教师菲奥娜·贝弗里奇对此表示同意，她说：“我不认为只有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毕业生才能满足未来的社会需求，文化和创意产业需要具有人文背景的学生。”

英国的人文类学科同样面临着政府偏好的困境。就在去年，英国教育部长尼克·摩根提出“能够使年轻人在各种行业面前都保有选择权的专业就是 STEM”，这种说法加剧了人文学科的不安。

摩根的言论激起了英国学者的愤怒。哥伦布说：“摩根的这一说法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人为地设立了对立。这种简单、懒惰的归纳性观点在没有经过讨论前，不应该被纳入政府决策。”

“不重要的研究”

“这种观点隐含的意思在于，越是隐晦的研究就越不重要。”伦敦大学东方与非



洲研究学院 (SOAS) 前主管理查德·布莱克说:“英国目前的政治说辞和日本几乎是相同的——政治家认为, 钱应该花在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研究上。”

2010 年, 英国时任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要求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 (Hefce) 的活动应该有对于 STEM 学科的宣传。因此, Hefce 投入了 1000 万英镑用以激励大学推进这些“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学科发展。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哲学系面临关张的危机。一场拯救密德萨斯哲学系的活动就此爆发, 在 facebook 上有超过 10000 人声援。不过, 该哲学系还是在 2013 年被调整且缩减了规模。

剑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马丁·德顿说:“如果我们不再追问哲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 我们如何能理解一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比如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 呢?”

他指出, 现在哲学逐渐变成科学之后的第二位存在, “这很危险, 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且发挥作用。”另外, 有些人文学科的院系如一些外国语言, 由于本身能吸引的学生数量很少, 很可能逐渐被淘汰。

变得脆弱的专业

“我十分关心人文学科特定领域的基金资助问题。”布莱克介绍道, 今年, 在 SOAS 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这样的事: 政府不再对语言教学提供直接资助。“照目前的趋势看, 如果大学必须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办学的话, 那么一些非常小众的专业将变得十分脆弱。”

事实上, 许多人文和社科类的院系近年来都面临着困境。今年, 由于“招生和教工形势的新变化”, 诺丁汉大学停止创业写作学士学位的招生。萨里大学今年戏剧性地缩减了政治学系的规模, 并辞退了许多教工。但是, 也有人敏锐地指出, 并不是只有人文学科面临此种威胁。英国大学联盟称:“所有的领域都面临压力, 不仅仅是人文和社科类。”

日本研究学者马克·彭德尔顿说, 日本对政府削减人文社科规模事件的回应, 目前看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日本正在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人们对于人文社科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 已经展开了大量讨论。”他说:“正因如此, 安倍政府的支持率迅速下跌, 而这种变化则是令人振奋的。”

(作者: 亚历克斯·迪恩, 系英国《卫报》撰稿人)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5-10-08)